

## 喜读清华感师恩

○孙景瑞(1949中文)

我以欢欣的心情迎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，回忆在母校读书的生活特别是老师们真挚而具体的关怀，永远留在我心中。

我是1946年由临时大学二分班（北京大学文学院）分配到清华大学中文系的，学号354007。“35”表示1946年，“4”表示四年级，“007”是名次。按说，我只要读一年，1947年就可以毕业了，但因我的特殊情况，延迟到1949年。

我的特殊情况是半工半读。我陷入半工半读的情况，是因为贫穷，没有饭吃。我依赖祖父做仆人的收入，读到中学。毕业后，祖父去世，收入断绝，家里只有寡母一人，经济困难，为了不失学，考入公费留学日本。但到日本一年后，日本本土遭到美军轰炸，无法读书，便休学归国，回到农村老家闲住，想终生务农。母亲不满我情绪消沉，仍希望我上学，但没有钱，怎么读书呢？母亲决心把家里仅有的三亩地卖掉，供我到北京考大学。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插班生。一年后，即1945年8月，日寇投降，北大改名临时大学，又读一年，等待重新分配。1946年暑假，母亲所卖三亩地的钱已花光，又陷入没饭吃的困境。正在走投无路时，偶然见到刚刚复刊的《世界日报》所办“北平新闻专科学校”招考编采特班，两个月毕业，可进报社工作。从入学起即发给生活补贴，入社后改发薪金。这条路救了急，为了有饭吃，我先入学，后入



孙景瑞  
学长

社，担任教育版编辑兼记者。时为1946年9月。一个月后，我被分配到清华。一方面喜出望外，一方面忧心忡忡。上了清华这所名校，当然喜；如果离开报社，没了经济收入，又是忧。在两难之间，我在清华先注册上了学。

中文系主任朱自清老师每次上课都点名。我有时迟到，有时有采访任务缺课，这引起了他的关注。有一天，他在路上遇到我，关心地问我为什么总是迟到、缺课？我如实地说明了生活困难情况，并说每天早晨6点从城里西单报社骑车出城，奔波二三十里地来校上课，有时刮风下雨，有时车子坏了，难免迟到；有必要的采访任务，难免缺课。傍晚，又得从学校进城上夜班，迟到缺勤也不行。朱自清老师认真听了我的难处，非常同情，深有所感地说：“我一回到北平，便觉得物价涨，粮食贵，人人要吃饭，天天要吃饭，

## □ 庆祝建校100周年

没想到抗战胜利后吃饭更难了！”他又回忆似地说：“前年，我也因为生活困难，除了在西南联大上课外，还在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，十分劳累，结果，课没上好，身体也坏了，胃病时常发作。人是要先吃饭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话头一转：

“你既要读书，又要工作，两头儿都顾不了，何不先解决吃饭问题呢？天天城里城外跑，也会搞坏身体。”他又商量似地说：“先解决吃饭问题，就是让你先休学一年，安心工作，再积存一点儿钱，明年复学好好读书，你看怎么样呢？”我当时没做决定，过了几天，才答应休学。转过年来，朱自清老师在《大公报》发表了一篇《论吃饭》，论述了吃饭第一的道理。

1947年4月，我接到清华同学邀请，回校参加为纪念“五四”举行的“诗与歌”晚会。在会上，意外地见到了朱自清老师，听他讲了《闻一多先生和诗》。散会后，我和朱先生一起走出会场，想跟他商量一下9月复学的事。我一提起，他便感慨地说：“抗战胜利以后，我以为人民的生活应该过好，内战也应该不打，可是我过于乐观了。物价一天涨几次，特务到处抓人，内战越打越凶，我们只有以闻一多为榜样，用不怕牺牲的精神去斗争，才能实现一个美好的世界。”接着，他的话题才谈到我，“你在报社工作，也不会有多少钱能存下来，跟去年一样，生活困难还是解决不了。我现在赞成你半工半读了。不过，一年的学分可以分两年念，上课时间少一半，你便有多一点时间工作了。”我听后，对朱老师设身处地为我着想的做法十分感动，高兴地说：“朱老师，你这个主意真好，我正为这事发愁

呢！”

就这样，1947年暑假后开学，我把毕业年限由1948年延至1949年。

没想到，注册选课出了问题。开学后，训导长褚士荃老师找我，拿出我选雷海宗先生历史课的一张选课单，说是我假冒雷先生签名，并说，“他建议把你开除。”我一听就傻了。这张选课单，是我因赶5点钟校车进城，委托同班一个同学代送的，难道是他干的？我立刻把情况说明。褚训导长听了，沉吟许久，才说：

“你去找系主任朱先生，请他向雷先生说明情况，再对你做处理。”我心急火燎地找到朱自清老师，把情况说明。他听了，感慨地说：“朋友并不都是靠得住的！”随后，答应去找雷海宗先生，并嘱我除雷先生的课，其他课照常上。过了三四天，朱老师问我褚训导长找过我有没有？我说没有。他说“雷先生也没想到这事不是你干的，既然如此，他同意你留校继续读书。一个青年人，不做点错事是不可能的；做了错事，能长见识，变得明智起来。你的过错在于不自己选课，尽管赶校车，也不是不能避免；如果你抓紧时间，完全可以在5点前选完。”朱老师谈话第二天，褚训导长便找我，一见面就说：“你可以留校继续学习，不过，为了警戒你，还是记大过两次。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我想了想，问道：“要不要向雷海宗先生道歉呢？”褚训导长一听，笑了，轻松地说：

“这事你自己决定吧！”后来，我跑到历史系，向雷先生当面表示歉意。我记得雷先生说：“我没要求你道歉啊！”事后，我找那位搞假签名的同学责问，他说，朱先生已指责过他了，他已作了检讨。他

说，那天，他去历史系找雷先生，可是不在，本可以去家里找，一见办公桌上有雷先生签名的选课单，就灵机一动，模仿笔迹代签了。后来，我俩成了知己。

就这样，我继续在清华上学，中文系别的老师对我也很关怀。

有一天，我们班几个同学到李广田教授家吃饺子。饭后，他关心地问我母亲在老家生活怎么样？我既惊讶又感动，他怎么知道我母亲呢？我说，母亲孤身在家，因为没有土地收入，我又寄不了多少钱，有时需要靠亲戚帮助。李广田先生热情地说：“如果需要，我也可以接济；我们教授的薪水虽然因物价上涨，也面临吃饭问题，比你总强一些吧！”我听了，激动万分，双眼含泪地说：“老师的心比钱更重要！”

还有一次，陈梦家教授邀我班几个同学到胜因院12号的家中去看甲骨文。他搬出几盒收藏的甲骨文，讲课似地讲它的发现历史，以及文字释义，和衍变成今天所用汉字的过程。同学们听了，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不少问题，陈先生一一回答，比在教室上课生动多了。我没有想到，陈先生也关心我的困难情况，真诚地说：“我太太还在美国没有回来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生活，薪水有点富余，可以帮助你每月在学校饭厅吃饭。”我听了，感动地说：“我不可能在学校饭厅吃饭，早上出城来不及，晚上进城也来不及，只能在报社附近街头饭摊上凑合；午饭忍一忍，也就免了！谢谢老师的好意！”

还有教古典诗词的余冠英教授，家住照澜院11号。有一次，我以学生兼记者的身份去访问他，请他谈谈古诗今译的问

题。他热情地接待我，没想到我还没提问题，他先关切地问我的生活状况。他听完我的回答后，亲切地向我讲了一些古人的成长之路，说凡是穷苦之家出身，经过艰难困苦，坚持到底都能成功。他还举了几个例子，如贫居陋巷，箪食瓢饮的颜回；又如家贫囊萤映读的车胤和映雪就读的孙康，等等。老师的教诲，从思想上鼓励我挺身面对困难，进而精神得到升华。

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老师病逝。暑假开学后，由浦江清教授代理系主任。我面临着1949年毕业，必须着手写毕业论文的情况。开学不久觉得论文有些困难，正在犯愁，浦先生主动找我谈话：“朱自清先生逝世前，向我交代你的研究方向放在元曲方面。他考虑你可能缺少做学问的时间，让我对你具体帮助。”我听后深受感动，更增加了对朱先生的钦佩和敬仰。浦江清老师说，遵照朱先生的嘱咐，他决定帮助我完成毕业论文，随即交给我两页纸：一页论文写作提纲，一页是必读书目。他叫我每天没课时便到图书馆查书，看书，摘记材料，准备一个学期，转过来一开学，便开始写论文初稿。对浦先生这样精心的安排和具体帮助，我真是感动得无以言表，一一照做了。

但是，时局发生变化，清华大学于1948年12月提前解放；北平也于1949年1月和平解放，师生们处于一种昂扬激扬的情绪中。为了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，我于3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，穿上军衣，告别了母校。60多年来，我时时刻刻怀念母校的温暖，念念不忘老师们春风化雨的教诲。